



血腥的皇权

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

阮景东 著

让大明王朝君臣都不得不服的巨作

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从政治斗争角度讲述明朝三百年大历史的著作
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跳出中国两千年来儒家史观

江西高校出版社

血腥的皇权

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

阮景东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 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腥的皇权: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 / 阮景东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93-1873-5

I. ①血… II. ①阮… III. ①皇帝—关系—大臣—中国—明代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135 号

血腥的皇权: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

XUEXING DE HUANGQUAN:MINGDAI JUNCHEN DE ZHENGZHI DOUZHENG

阮景东 著

责任编辑	邱建国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95397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4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1873-5
定 价	32.8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3-1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当历史学家发现中国的明王朝具备许多无与伦比的特点的时候，他们便对这个王朝倾注了更多的关注。

的确，明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巅峰王朝，这里有成熟完备的政治体制——内阁，这里有颠覆农业文明的商业文明，这里有空前繁华的市井文化，这里有意志决绝的士大夫，这里有激烈辩论开放式的儒学思想，这里有孤独无助的君主，这里有为了命运抗争的底层人物，这里还有东方第一位开眼看西方的人物——瞿太素，这里还有中国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王艮，这里更有东方的布鲁诺——何心隐。

一个将儒家文明推向极致的王朝，一个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王朝，一个商业文明极度发展的王朝，一个产业时代来临的王朝，一个各项指标在农耕时代达到临界点的王朝为何会在 1645 年轰然倒塌？历史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总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是却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大唐王朝 846 年只是历史上一个渺小的点，在这一年，持续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以李党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国结束了浪漫的贵族政治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文官政治时代，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文官政治无疑是灾难性的，从牛李两党对于藩镇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贵族与平民在政治决策上的全局性与局部性。同样，现在看来，大明王朝 1449 年也是明王朝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经历土木堡之变，帝国的勋贵折损殆尽，帝国重回文官政治运行的模式，就这样，在经过大明王朝八十一年统治后，历史终于又回到了它本来的运行轨道。从此一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历史从经济形态方面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部落时期、农耕时期、机器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将中国社会从部落时代推向农耕时代，1840 年西方势力

的入侵将中国从农耕时代推向机器时代，而农耕社会的巅峰时代——明王朝——总给人留下许多值得关注的东西。本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对明代三百年大历史进行讲述，并由此探讨王朝兴衰和明王朝灭亡的最本质原因。

明代由于官僚制度的强大和商业经济的兴起，以及受教育人口的增多以及市民意识的觉醒，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官僚阶层和市民阶层的矛盾冲突比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要尖锐，除此之外，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和倾轧也比历代王朝都要激烈，更多的华彩篇章都在这个时代上演，人人都不再是君子，而人人又都不甘心成为小人，奋发与消沉并存，调和与冲突同在。我们对这种政治斗争评价无疑是负面的，因为它会降低王朝的凝聚力。但它对历史学家却又是精彩的。

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创立并非想象中那么艰难，前面已经有许多英雄人物作了铺垫。有感于元朝思想领域的混乱，朱元璋在建立天下后开始用理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他还通过抑制豪强来还给天下一个自耕农的社会，洪武皇帝是一个偏激而纯粹的人，在他的治理下，帝国僵硬而沉闷，官僚们都在等着他死，洪武皇帝的尽快死去成了这个时代官僚们的唯一希望。

建文皇帝朱允炆是按照儒家伦序原则继承皇位，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几个腐儒的唆使下盲目削藩，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帝位。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是太宗文皇帝朱棣，外藩继位的身份一直是他心中永远的阴影，为了昭示他的伟大，他开始折腾这个国家和人民，如果帝国在他的统治期间灭亡，那么朱棣在历史上的名声将会跟随炆帝一样糟糕。

朱棣的死是帝国的转折点，从这之后，帝国结束了洪武、永乐的那种扩张态势，开始一意主守，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开始从皇帝手中向官僚手中转移。洪熙、宣德两位皇帝在位的时候开始对洪武、永乐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但宣德皇帝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他能够压制住跃跃欲试的文官。

宣德的死亡标志着君主与官僚的融洽关系再也无法成为可能，后面的君主虽然年纪幼小而且娇生惯养，但他们却显示出跟祖辈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阴晴不定、手段毒辣。为了压制住日益崛起的文官，正统启用宦官王振，王振试图将天下拉回洪武时代，这是全体官僚所不允许的。帝国在王振的主持下在一些政务上产生了偏差，不仅搞得人怨沸腾，而且还对蒙古实行了强硬政策，这最终导致土木堡事件的爆发，帝国进入动荡期。

再次继位的英宗皇帝成熟起来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报复他人,他任用贤臣、能臣,同时他开始躲在幕后,以一双阴鸷的眼睛盯着那些勋贵和官僚,这个皇帝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他不会因为你帮助他而感谢你,也不会因为你对不起他而报复你。

英宗皇帝的继任者是成化皇帝,这是一个很木讷的皇帝,他迷恋他的保姆万贵妃,他信奉道教和方术,他绕开内阁直接发旨。成化王朝无疑是整个明朝时代的转折点,从这个时期开始,帝国的官僚政治正式进入成熟,皇帝开始垂衣拱手,商业与思想领域也开始松动,它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脉络前进。

从洪武到成化,我们所关注的是体制的推进,它从元朝体制向具备明朝特色的体制上转变,它的内阁开始成熟,制约内阁的司礼监也在形成,帝国开始依靠两套班子来运作,一套文官班子,一套宦官班子,一切都已经程序化,所有的政务最终都是依靠文牍来处理,而这种程序化的政务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就会受阻。这的确是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它能够保证帝国即便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也能够按照惯性平稳运转多年,并杜绝了一切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它不需要能人、强人,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官僚,但是它阻碍变革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一些早已程式化或者惯性的东西又将会束缚帝国的发展,并最终在一些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使我们这个帝国轰然倒塌。

从弘治开始,明王朝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是文官开始兴起,以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为标志,明王朝的文官集团全面崛起,并在万历晚期达到了最高峰。

在奉行儒家文化的古代中国,政治权力终将会落入文官手中,政治益发依赖娴熟的官僚集团来运作,而不再是英明的君主。这是各种因素发展的结果,贵族的没落是一个因素,官吏的选拔日益依赖科举是一个因素,印刷术的发展导致受教育人口增多是一个因素,商业发展、财富积累、市民意识的觉醒也是一个因素,后世君主对权力的淡薄也同样是一个因素。这种文官政治对于小国寡民的西方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于复杂而庞大的东方大国来说往往会带来消极影响,因为文官政治运行的结果往往是私有制的盛行,中央集权的削弱,财富日益向士绅手中集中,这些都会使一个庞大国家在面对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捉肘见襟,这点在晚明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对于这种文官政治的评价也同样是矛盾的,文官政治会减少君主专制所带来决策上的风险性,但是由于文官政治决策的局部性和君主政治决策的全

局性所带来的偏差也会在帝国酿起波澜，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做出评价，因为历史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模式，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荡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任何想阻止这个历史规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历史问题讲清楚。

弘治皇帝被认为是一位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君主，在他主政的十八年是皇帝与文臣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虽然如此，但弘治十八年本质上说仍然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他的继任者正德最反感儒家的说教，而且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从正德开始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开始成为帝国以后政治运行的主要特点，并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而正德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唐伯虎和王阳明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心学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

接下来是嘉靖时期，嘉靖被认为是明朝最糟糕的一个皇帝，明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就在这个时期，嘉靖对文官的憎恨达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看着文臣们斗来斗去。这个时期虽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明王朝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就是倭寇问题，嘉靖时期也是明王朝仅次于万历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嘉靖皇帝御极四十五年，仅次于万历皇帝的四十八年，这四十五年也是明朝党争开始和各种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四十五年。

嘉靖的继任者为隆庆皇帝，隆庆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无能且受人操纵的皇帝，但这只是表象。隆庆皇帝虽然安居在幕后，但隆庆的七年时期是中国明王朝政府政治决策最好的七年，它能够跟宣德、弘治相媲美。隆庆皇帝有着寻常人看不出来的政治运作艺术，他能够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达到一切政治目标，并使得帝国安静、宁和，不再那么无聊的吵闹。隆庆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出朝中清流的虚伪与狡诈，为了达到目的，清流也是不择手段，在隆庆死后，这种宁和、安详的氛围便不复存在了，他被自以为是的张居正搞得一团糟。

万历王朝是明代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不仅仅是因为万历是明代御极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四十八年），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所有的指标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临界点。

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运动正式发端，工会组织开始形成，基督教传入中国，启蒙思想进一步发展，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市井文化进入成熟，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党社运动在民间蔓延，参政群体日益扩大，舆论开始民间化，士大夫的活跃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皇帝与文官的矛盾更是空前激化，商业文明

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同样空前尖锐，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上演。

万历皇帝跟明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并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这正像我们前面讲的，政治的发展使得帝国日益依靠娴熟的官僚和平衡的体制，而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无论君主在这里扮演何种角色，最终要么将问题弄糟，要么就是无功而返。朱元璋的强大个人能力都未能对历史产生任何改变，更别说后世的君主，所有这一切又都只能在循且中度过，这种循且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或政权都无法运转，而这个时候皇帝与官僚的矛盾又会突出出来，皇帝这个时候的专制绝不是胡来，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将看到许多人虚伪的嘴脸。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前十年外廷有张居正，内廷有李太后、冯保。当张居正死后、冯保被贬黜、李太后不再管事的时候，皇帝发觉自己仍然无法亲自实施政务，因为有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在前面，皇帝只用执行礼仪上的问题即可，但他渐渐地发现单纯的垂衣拱手也是不可，因为君主考虑的是整体，而官僚考虑的是局部，我们是个复杂而庞大的农耕国家，不能像英国那样完全将权力交给士绅去打理。所以，我们看到万历后期皇帝与官僚们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从万历中期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东林党，这个党派的特点是抵制一切非本党人士，他们蹦的很高，拿道德文章替自己涂脂抹粉，更为要命的是这个党派的成员大多出身于缙绅和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自然要代表本团体的利益，万历增加商业税收的命令遭到了这个党派的一致抵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柔性革命在帝国已经成功。这个党派的结局并不好，在下一个朝代，在魏忠贤的打击下他们集体噤声，魏忠贤死后他们又死灰复燃，并最终将帝国推向灭亡。满清入关后，他们很快跟这个新兴的政权合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并无国家、民族和道德的观念，所关心的只是团体的利益。

当万历死后，他的可怜的长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但身体不好的朱常洛只上任一个月便死掉了。他的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在朱由校主政的最初日子里，重返朝政的东林党继续纠住三案不放，将三案矛头向万历和郑贵妃身上扯，这不仅引起了朱常洛的愤怒，也引起了朱由校的愤怒，东林党的表演再次弄巧成拙。天启四年是天启王朝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开始任用一些新的官员来排斥东林党人，也就是从这之后，皇帝开始隐居在幕后。

天启王朝是意志决绝的，它至少没有像崇祯王朝那么看起来散乱，皇帝仍然坚持征收商业税，另外，君臣保持了空前的团结，它不像前几朝那样叽叽喳喳。天

启皇帝的治国手段是高明的，他以很小的代价就实现了嘉靖所期待的那种治国效果，既没有让群臣争来争去，也没有让群臣骂来骂去，万历朝的那种混乱局面一下得到了安宁。

天启的继任者是崇祯皇帝，在崇祯手里帝国最终进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加重，另一方面是由于崇祯皇帝混乱无序的性格。崇祯皇帝最初想重用东林党人，当他发现这个党派排除异己的时候，他便开始任用新的阵营的人。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辅助下，中枢保持了稳定，但对于一般人事任用，皇帝显得急躁而混乱。

朱由检渐渐地发现了这些科举出来的人大多只会夸夸其谈，并无治国的才能，他便想打破这种科举选才的制度，旧的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崇祯轻易用人，轻易罢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混乱。

崇祯朝的最大问题是皇帝在一切问题上显得急切而冒进，他不顾帝国已处于疲弱的状态，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崇祯就会显得急躁而不安，甚至会迁怒到他人。不仅如此，文官制度的那种僵硬性也不符合明末的实际情况，帝国的一些僵硬政策仍旧在执行，尤其是在跟满洲人议和问题上。所有人都不愿意为一些灵活的政策而再负责任，这其中包括好面子的皇帝。

由于1644年清兵入关后，清政权控制的还只是黄河以北，所以南京的弘光政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再加上大明王朝是两京十三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的末代皇帝乃是弘光而不是崇祯。

当北京城失去后，南方的官员以及逃到南方的官员扶植万历的孙子朱由菘登上皇位，但此时那种能够稳定局势的文官政治已经不复存在。更加激烈的党争开始，破产的财政使得帝国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军阀政治重新出现，而帝国也并没有鼓励地方豪强参与镇压农民军或者抵御清兵，实际上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清兵来的都很迅猛。

南方的弘光政权是涣散的，虽然在此之后又建立了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并维系了十七年，但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

当时间进入晚明，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帝国的征税权被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抵制，再加上延绵七十年的北半球气候冰河期，加上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粮食减产，这些都使得明王朝的继续已经不可为。

但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那种儒家思想的死结禁锢了帝国，它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或者西方的某种主义来破解晚明迷局。

第一章 从洪武之治到阴霾下的天顺

- | | |
|------------------|-----|
| 1. 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 | 001 |
| 2. 朱允炆和朱棣 | 011 |
| 3. 解缙的悲剧人生 | 019 |
| 4. 洪熙皇帝与李时勉 | 023 |
| 5. 宣德年的权力斗争 | 026 |
| 6. 火药桶的点燃者——王振 | 034 |
| 7. 土木堡之灾——历史的转折点 | 044 |
| 8. 阴霾下的景泰和天顺王朝 | 051 |

第二章 成化政治冲突到嘉靖财政危机

- | | |
|-----------------|-----|
| 1. 成化初年的政治冲突 | 062 |
| 2. 汪直和他的西厂 | 068 |
| 3. 儒家文化压抑下的弘治皇帝 | 076 |
| 4. 正德初年的政治风波 | 082 |
| 5. 刘瑾时代 | 087 |
| 6. 皇帝的武功 | 091 |

7. 大规模的政治请愿活动	100
8. 宁王叛乱与正德南巡	103
9. 大礼仪之争	111
10. 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们	129
11. 财政危机与帝国备倭	141
12. 江右学派与严嵩之死	153
13. 嘉靖与海瑞	159

第三章 隆庆王朝的开关到万历的没落

1. 隆庆王朝的政治斗争	164
2. 牢固的铁三角	172
3. 铁三角压制下的万历皇帝	179
4. 反张运动	183
5. 失败的万历亲政	199
6. 国本之争	205
7. 申时行的遗憾	212
8. 东林党	216
9. 矿税斗争	222
10. 妖书案和挺击案	227
11. 万历王朝的政治斗争	234
12. 红丸案与移宫案	237

第四章 天启党争和帝国的安静

- | | |
|-----------------|-----|
| 1. 天启皇帝和天启初年的党争 | 240 |
| 2. 千古奇冤熊廷弼 | 253 |
| 3. 孙承宗和他错误的辽东战略 | 255 |
| 4. 《三朝要典》与五人墓碑记 | 259 |
| 5. 意志决绝的天启王朝 | 262 |

第五章 崇祯皇帝和东林党的春天

- | | |
|--------------------|-----|
| 1. 崇祯皇帝与阉党的覆灭 | 265 |
| 2. 温钱互攻与己巳之变 | 268 |
| 3. 中兴之梦 | 278 |
| 4. 体仁内阁 | 283 |
| 5. 应社与复社 | 288 |
| 6. 周延儒的二次组阁 | 294 |
| 7. 杨鹤的主抚和洪承畴的主剿 | 296 |
| 8.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和景山自缢 | 300 |
| 9. 偏激而又无序的崇祯王朝 | 304 |

第六章 明王朝的灭亡

1. 南明王朝的政治斗争 308

2. 明朝灭亡原因与明代政治斗争史 326

参考文献 338

第一章 从洪武之治到阴霾下的天顺

1. 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

朱元璋对于明帝国的建立再造了汉人王朝和汉族文明。现在看来朱元璋建立的很多制度都保证了这个王朝的安定,成年皇子必须离京,以文驭武,皇室只能跟平民联姻,军户制度,遍布帝国的御史分巡道制度,乃至洪武年内阁的雏形,这些都无疑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而设计的。

整个洪武朝,在政治斗争方面我们关注的焦点还是皇帝跟李善长的关系,可以说朱李二人的矛盾斗争握住了整个国初的政治脉络,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所关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

李善长本是朱元璋的乡谊,虽然有志官场,奈何天赋不高,无法在科举中胜出,到了不惑之年依然是一事无成,但长期的隐忍早已使得李善长内心波澜不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李或许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选择了朱元璋。他为什么选择了朱元璋?有的说辞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无法在其他诸侯那里找到位置。

李善长淮西人的身份和处事稳重的特点很快博得朱元璋的信任,他开始替朱元璋打理内务,总管钱粮、赋税、田土、人口,他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令朱元璋无后顾之忧。李善长具备的是经世致用之才,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天纬地之才或许在王朝的开建中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李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也使得他能够跟朱元璋的这些武将们打成一片,由此带来一个盘根错节的

淮西集团,无论这个集团看起来多么松散,但它是那么的牢不可破,这个集团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缚了一代帝王。

大明开国后,李善长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长的功劳与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长的微妙关系从何时开始或许我们无从得知,但李善长位列中枢后无疑加速了这种微妙。

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矛盾一直存在,从汉代至宋代都是采取提高内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机构的地位来削弱相权,到了元代,相权又有所加强。明初承元制,中书省总揽一切权力,且中书省的级别还高于当时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而且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在外,这样帝国的权力都集中在李善长手里,这是制度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权被抑制就是必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产生不快,但统一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朱元璋只好先放放。

李善长坐上了这个位子,开始培植淮西势力,这样一来众人纷纷走李善长的门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对朱元璋的嗜杀雄猜,文臣武将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长那里倾诉衷肠,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

虽然国初李善长已经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经对李善长显示出了冷漠,这种冷漠当事人当然是清楚的。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该离开庙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回来了,按例封赏晋爵,而坐镇后方的李善长也被封为韩国公,位列将军们之上,从这个微妙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经忌惮他了。一个令帝王忌惮的人终是离死亡不远,相反,一个令君主不断欺负的人却有着大好的前程。

李善长终于明白皇帝要赶他走了,但他在临走前却把胡惟庸安插进了中书省,这表明他并不想彻底离开庙堂,他想退居幕后遥控一切。

我想这个时刻洪武皇帝已经动了杀机,李善长到底缺乏处理复杂而微妙政治哲学的智慧。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

十年的时间,皇帝虽然不断处罚不符合他标准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向李善长挥去,他在忌惮,他在等待。十年后终于用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长,接下来又是一个十年,大批李善长的人马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诛杀,到了最后时刻洪武皇帝仍在犹豫,那就是对李善长的最终处理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二十年的隐忍,看到了一个皇帝抉择的痛苦,毕竟对方在帝国的创建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毕竟对方在自己创业时期就陪伴在自己左右。

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风烛残年，此时的朱元璋也是风烛残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长依然有着影响力，依然有着号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心向那个忠厚的长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长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备号召力，朱元璋闭上了眼睛，还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

人们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却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们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却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

中国士子既讲入世，也讲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李泌七岁时即被玄宗召入宫中作诗，后来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而被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刚刚继位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赏识，肃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职，但李泌只愿意以一个宾客的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李泌在后来的收复长安、洛阳等地立下功劳，后来却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李泌退出朝廷争斗的旋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纵观李泌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极好机会。但他却能审时度势，常常在大局转危为安后功成身退，而当朝廷出现危机时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可见李泌是聪明的，他的政治观是成熟的，他将中国古代那种士子之心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连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如果李善长能够彻底、干净离开庙堂，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国初最有趣的文臣不是李善长或者刘伯温，而是汪广洋与杨宪。

如果说国初的文臣都好琢磨，那最难琢磨的就是这位汪广洋，可以说在国初所有文臣中，朱元璋最看好的就是这位汪广洋，朱元璋最寄以希望的也是他，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

在明初那段峥嵘岁月中，并没有多少令皇帝满意的文臣，李善长水平不高且为人刻薄，刘伯温清高而矫情，胡惟庸小吏角色，杨宪又过于愚蠢，真正有名士风度的唯汪广洋一人而已。

汪广洋是元朝末年的一名进士，虽然是一名进士但并没有授缺，他一直在安徽太平这个地方闲居，朱元璋攻下太平后，便召见了汪广洋，两人谈得甚欢，从此

汪广洋在朱元璋麾下既管军又管民,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立于淮西集团之外的人。另外一个独立于淮西集团之外的人是杨宪。

杨宪是检校出身,他能够把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报告给朱元璋,所以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整个官场皆被淮西势力控制的情况下,洪武皇帝能够用来制衡淮西集团的也就是汪广洋跟杨宪两人。朱元璋将杨宪塞进中书省,让他任右丞,是想让他制衡李善长,但后来朱元璋发现杨宪是一蠢人。

明初第一酷吏是杨宪,他善于捕风捉影,心狠手辣。杨宪一进入中书省便开始向李善长猛烈地进攻,直接叫嚣李善长能力平庸应该下台,这明显超出朱元璋的预料。洪武皇帝并不想让他这样搞李善长,这样做会很被动,会让朱元璋下不了台,其结果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此时的洪武皇帝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压制住杨宪,而不是李善长了。

朱元璋选中了一个人,一个他老早就想用的人——汪广洋,此时的汪广洋已经外放多年,朱元璋又把汪广洋塞进了中书省,任左丞职位。这中书省职位排序为左丞相、右丞相、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由于此时的李善长已经离职,徐达又领兵在外,所以这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便是汪广洋。

朱元璋想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也想让汪广洋压制杨宪,但朱元璋发现不仅杨宪超出了他的掌控,汪广洋也超出了他的掌控。

汪广洋并没有像朱元璋期待的那样搞杨宪,汪广洋采取的是毫不作为的方针,大事仍然是由杨宪处理,不仅如此,杨宪竟然开始搞汪广洋,可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却让杨宪抓不住把柄,最后杨宪竟然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得了,既然你不想干事,那你就走吧。”这是朱元璋的想法,于是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外放到海南岛。

汪广洋离开了中书省,杨宪越发肆无忌惮,继续向淮西集团猖狂进攻,终于被李善长抓住了把柄,逼迫朱元璋杀了杨宪。洪武皇帝并不想杀杨宪,但杨宪的存在打乱了皇帝对付淮西集团的全盘计划。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面对李党的威逼,洪武皇帝不得不用杀杨宪的方式来安抚李党成员。李善长依然强大,从中枢到地方仍然都是他的人,但仇恨会在洪武皇帝心中越积越多,直到洪武二十三年的到来。

杨宪死后,在李善长的安排下,胡惟庸由参知政事升任中书省左丞,面对李善长咄咄逼人的架势,朱元璋将汪广洋从海南调回中书省,升任右丞相,希望汪